

明日观花

七八十年代苏联小说的形式、风格问题

石南征 著

MINGRIGUANHUA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明日观花

——七八十年代苏联小说的形式、风格问题

石南征 著

江蓝生先生指正

作者敬赠

九七岁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7.2.1

明日观花

七八十年代苏联小说的形式、风格问题

石南征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政编码:100732)

新华书店经销 国防大学第一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开本 9印张 240千字

印数 0001—1000

1997年1月第一版 1997年1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50-881-1/G·173 定价:17.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Содержание

Введение

Глава первая. Стилъ: новые поиски в теории

1. “Что такое стилъ?”
2. Спор о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сти и общности

Глава вторая. Речь: изменение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повествования

1. Путь развития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повествования в советской прозе
2. Первое лицо: автобиографичность и внутренняя точка зрения
3. Первое лицо: от событийного описания к психологизму
4. Третье лицо: обаяние “минимального критерия”
5. Которое(?) лицо: волшебство свободного перехода

Глава третья. Образ: расцвет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условности

1. Вопрос о типологии условных форм
2. Смысл за образом
3. Правдивость в деформации

4. Под лучами мифа

Глава четвёртая. Синтез: “интенсифная” поэтика

1. Эпос и “микроэпика”

2. Типология новых структур

Литература

Послесловие

目 录

引 论	(1)
第一章 风格 理论上的新探索	(11)
第一节 “什么是风格?”	(11)
第二节 个性与共性之争	(20)
第二章 话语——叙述视点的转移	(35)
第一节 苏联小说的视点发展轨迹	(35)
第二节 第一人称：自传性与内视性	(39)
第三节 第一人称：从事件到心理	(68)
第四节 第三人称：“最低标准”的魅力	(89)
第五节 第？人称：自由转换的魔力	(127)
第三章 形象 文学假定性的蔚起	(145)
第一节 假定性形式的类型划分问题	(145)
第二节 象外之旨的追寻	(149)
第三节 以奇异熔铸真实	(175)
第四节 借助神话的光焰	(219)
第四章 综合——集约性诗学的诞生	(248)
第一节 史诗情结与“微型史诗”	(248)
第二节 新型结构形态描述	(256)
主要俄文参考书目	(275)
后 记	(281)

引 论

谈论“当代”苏联文学，不过是昨天的事。

笔者对本课题的关注，大部分时间是在“当代”名下进行的。然而，一夜之间，世移事易，苏联文学永远告别了“当代”。这可真如古语所说：“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作为研究者，亲眼看到这样一个文学过程的完结，并在这么近的距离来作历史的回顾，也是少有的经历。

这里，落入视野的，基本上仍是原先关注的那个时期，那个方面，即七八十年代的苏联小说在形式、风格上的探索。研究范围大致如前，但课题性质却发生了变化，从偏于现状性的课题变为确凿无疑的历史性课题。课题性质不同，所需要的眼光自然是不一样的。

在文学批评中，以十年为期谈论文学，也是一种惯例了。然而，文学的发展并不遵循十年周期的限定。文学分期与十年纪年，应该是两回事，二者一般是不吻合的。所以，我们并不想将一个历史性课题置于两个十年的精确范围之内。首先，应该说明，“七八十年代的苏联小说”只是标明一个过程的大致年限。苏联小说在形式、风格上的一个探索高潮正出现在这一年限之内。其次，应该进一步说明，从事物发展的完整过程来看，探索中的某些倾向，一方面不独属于七八十年代，另一方面又不太适合于七八十年代的某些年份。因为，那些倾向在六十年代中期已经开始出现，而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苏联社会日益动荡，文学创作大幅度退潮，文学园地几乎被解禁作品所覆盖，已经很难说有什么值得注意的整体创作倾向了。确切地说，“七八十年代的苏联小说”是指六十年

代中期至八十年代中期的小说。因此，这里的“七八十年代”并不是一个字面所示的时间概念，而是一个代表着实际发展阶段的文学史概念。事实上，在文学史分期中，字面时间与文学发展的实际时间往往是不吻合的。比如，当我们倾向于将“二十世纪文学”理解为文学史概念时，一定不会认为，这一阶段文学的开端恰好两个世纪之交的精确时刻。

纵观苏联小说七十余年的发展，就形式、风格探索而言，大致走过了一个从多样到单一，又从单一到多样的历程。同时，这一历程同文学批评和理论的发展，文学观念的更新，社会思潮的变化，文艺政策的调整紧密相关。

二十年代前后是一个新旧交替，兴歇迅疾，思想空前活跃，充满幻想和探索的年代。作家们不是是宿将，还是新手，不管来自旧的营垒，还是诞生于革命硝烟中，都在凭着自己的信念和感觉，选择自己的艺术之路。谈及这一时期的小说形式，尽可以说它幼稚、粗糙、晦涩、甚至做作，但不能不说它样式繁多、手法丰富。而最难能可贵的是那种探索的气氛和势头。

三十年代中期至战后初年，则另是一番景象。不可否认，这一时期的“艺术生产”是轰轰烈烈的，也出现了一些有份量的作品。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就整体而言，形式、风格的单一化日趋明显。二十年代那种探索气氛和势头，一步步被清除，被遏制。究其原因，既有文学之外的，又有文学本身的。“创作方法”概念出自苏联本土。没有哪一国文学，围绕创作方法进行过那样系统的理论构建工作，发生过那样频繁的争论。为整个文学界规定统一的创作方法，也是苏联的首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作为统一的创作方法，写进苏联作协章程的。无论当时的历史条件有怎样特殊的需要，自从文学实现了方法的统一之后，艺术形式和风格也随之趋于统一，确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对于艺术，不知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悲的。尽管作协章程中明文规定，允许多种多样的艺术手段和风格存在，尽管一些有识之士早就呼吁，应该利用一切

有效的文学形式，然而长期以来，以“生活本身的形式”描绘生活的写实形式，还是成了整个文学，尤其是小说的正宗。在形式领域的各个方面，稍有出格的探索都会遭到蔑视和攻击，动辄被扣上“现代派”、“颓废派”的帽子。这是一个意识形态上极度敏感的时代。一切文学问题，甚至形式、风格问题，都首先是，甚至仅仅是意识形态问题。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中，艺术之花的多姿多彩自然是谈不上的。

五六十年代，小说创作在形式、风格探索方面重新活跃起来，及至七八十年代，这种势头变得更为强劲。新观念、新样式、新手段竞相涌现，并在不同规模上蔚为风气。从苏联小说的形式、风格探索的历程来看，第二个探索高潮正出现在七八十年代。比起二十年代前后的探索，无论从时间、规模、成果讲，都不可同日而语。其所以出现七八十年代的局面，自然有多方面的因素起作用。其中五十年代中期以来理论意识、批评意识和文学观念的更新，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在六十年代开始的一次次关于创作方法的争论中，无论是统一方法基础中的风格流派多样化派，还是创作方法多样化派，以及“开放体系”派，其内含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给多样的形式、风格探索以恰当的位置。

七十年代初出现的开放体系理论，既维护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唯一正统地位，又明确摆出开放姿态；既不像创作方法多样化那样直接威胁到根本的文艺体制，又比统一方法基础上的风格流派多样化的提法，显得更豁达，更具新意。因此，它得到更多人的支持，是很自然的事。开放体系理论初创之际，直接着眼于“表现手段”，而后才将“内容”纳入视野，可见其对形式问题的重视。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这也许是理论家们所能做出的最大文章了。虽然大而言之，开放体系之说对于维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大一统的地位，无异于江心补漏，但小而言之，这一提法在为创作中的形式、风格探索创造较为宽松的理论氛围和批评氛围上，起了一定的建设性作用。

问题不仅仅在于具体的理论提法。围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争论本身，反映出理论意识和批评意识已经发生变化。多数人已经意识到，固守僵化封闭的理论模式是没有出路的，对创作中的形式、风格问题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应该摒弃那些狭隘的门户之见。批评界有人说：“大约正是在七十年代，我们最终克服了那种把一切‘艰涩’的艺术结构，一切复杂的艺术语言，同现代主义和精英原则的影响相联系的诱惑。”^①

理论意识的发展从来不是步调一致的进军。争论是文学发展的重要形式。纵观五十年代以来发生的频繁争论，正常的对话性明显增加了。尤其像形式、风格这种远离敏感话题的争论，更是如此。或许正因为是对话，所以争论中往往没有明显的胜利者。争论的成果在于一些有启发性、有震撼力的思想的问世。这些思想经过后续的开掘和检验，其中有生命力的部分趋于成熟，渐渐融入普遍的理论意识和批评意识。

八十年代初，苏联批评界曾对刚刚过去的七十年代文学进行过总结，其中比较关注形式、风格问题。有人谈到，七十年代文学探索的最重要特征是主观性的全面增长。具体表现在两方面：其一，艺术力求洞察人的心灵，从而导致抒情化；其二，艺术追求广泛的概括，从而导致形象变形化。^②有人从思想和风格的结合上入手，概括出小说创作中的五种倾向：史诗化、心理化、道德探索、哲理和智性化、浪漫化。^③而八十年代文学无缘像七十年代文学那样，成为单独的审视对象。因为九十年代的来临，不仅意味着八十年代的结束，而且意味着整个苏联文学的完结，人们的兴趣很快转移到对整个苏联文学的反思上，而无暇单独顾及八十年代。不过，八十年代期间，不断有人谈及时的风格倾向。比如，

① 鲍恰罗夫：《无止境的探索》，莫斯科，苏联作家出版社，1982年，第417页。

② 埃利亚舍维奇：《七十年代的文学》，见《星》1979年第3期，第207页。

③ 鲍恰罗夫：《无止境的探索》，第416页。

有人概括出三种倾向：假定性倾向、纪实倾向、史诗倾向。^①

应该说，上述种种概括，在不同程度上触及到七八十年代小说的形式、风格的实质，但亦显不足：其一，思想和风格的结合有时演变为思想对风格的绝对统领。实际上，一种思想倾向未必以单一风格表现，而一种风格也未必只存在于某一种思想探索的作品之中。如，在七八十年代文学中，对道德探索的兴趣是普遍的，而写法并不拘于一格。我们只能在道德探索小说中，看到某些重复率较高的形式、风格因素，但无法找到统一的形式、风格特征；而且，这些重复率较高的形式、风格因素，在其它探索方向的作品中也可以见到。其二，对于七八十年代小说的形式、风格的新质，未给予足够的揭示。一个特定阶段的文学的形式、风格面貌，既包含着前一阶段的自然延续的旧质，又包含着独属于本阶段的蔚为风气的新质。从发展的角度说，对后者的揭示具有更重要的意义。笼统地谈论某种形式和风格，实际上抹煞了文学的不同发展阶段的质的差异。如，纪实倾向并不是七八十年代小说独有的特征，而是二十世纪世界文学以及苏联文学中，一种持续增强的倾向。至少在五六十年代的苏联小说中，已经明显表现出纪实特征。又如，史诗倾向亦不独属于七八十年代，而贯穿于苏联小说的大部分时期。因此，即使谈纪实倾向和史诗倾向，也应当把重点放在它们在七八十年代显现的新质上。

笔者以为，在七八十年代小说的层出不穷的形式、风格探索中，有三种倾向最引人注目，即：叙述上的客观化（内视化）、艺术描绘上的假定性化，以及艺术综合上的“集约化”。它们之所以引人注目，一方面因为它们新，作为群体倾向独属于七八十年代，因而在苏联文学史上显得分外惹眼，尤其是与三十年代中期至战后初年的小说面貌形成鲜明对比；另一方面，因为它们发展得比

① 古谢因诺夫：《在永远的运动中》，见《民族友谊》1980年第5期，第234—236页。

较充分和成熟，无论在量还是质上，都不容忽视。正是由于这三种倾向的出现，使七八十年代小说的整体风貌，获得一望而知的鲜明特征。三种倾向涉及小说形式、风格范畴的三个不同的方面：叙述话语性质，文学形象性质，艺术综合性质。

叙述的客观化是针对叙述者对叙述的主观介入而言，主要涉及叙述视点的设置、叙述者的隐显等问题。视点是对叙述信息的一种人为限制。“构成故事环境的各种事实从来不是‘以它们自身’出现，而总是根据某种眼光，某种观察点呈现在我们面前。”^①由于“眼光”、“观察点”相对于故事的位置不同，便有了所谓内视点、外视点、全知视点的区别。通过主人公的视野来展示故事的写法，在十九世纪后期欧洲小说中已经频繁出现。后来，经过亨利·詹姆斯等人的倡导，全知视点迅速遭到冷遇，内视点叙述形式成为二十世纪西方小说的新范式。然而，苏联文学作为一种新型文学，由于自身的需要，在小说叙述形式上却走着另一条道路。在相当长时间里，全知视点被视为最主要的叙述形式。五六十年代，全知叙述者对叙述的过分介入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到了七八十年代，叙述的客观化进程明显加快，内视化潮流形成相当规模，一些文坛主导作家纷纷加入到这一潮流中来，全知视点的统治地位终于被打破。内视化进程对小说的情节、结构、语言产生了极大影响，使七八十年代小说的整体风貌出现了醒目的变化。

文学假定性^②问题自五十年代以来，一直是苏联文学理论和创作的焦点问题。假定性是指一种文学形象的描绘方式，或者说艺术造型方式。广而言之，艺术即假定性。而我们这里谈的是狭

① 兹维坦·托多罗夫：《文学作品分析》，见《叙述学研究》，张寅德编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65页。

② 这一概念在传统意义上指艺术手法的规范化、标准化，译为“程式化”更妥。而当代意义上的假定性概念出自苏联文艺学，严格的科学界定是在六十年代。这里用的是其当代意义。

义的假定性，即艺术范畴之内相对于写实性而言的形象特性。凡有意偏离写实性的，均可归入假定性。其所以强调“有意”，是说假定性必须以上体的自觉性为基础。^① 仅怪诞离奇本身还不是假定性，还须有主体对怪诞离奇的清醒认识。因此，假定性与写实性之间并没有恒久不变的界限，二者随着历史的变化而相互转化。说假定性是七八十年代苏联小说的一种新倾向，并非意味着以往的苏联文学是清一色的写实文学，而同象征、隐喻、幻想、怪诞、神话等非写实因素无缘。关于这一点，只要回顾一下布尔加科夫和普拉东诺夫等人的创作就够了。然而，只有在七八十年代，才能从样式繁多而又蔚为风气的意义上，谈论创作的假定性。这一时期，对假定性感兴趣的并非个别作家。除了那些基于本民族文学传统而同假定性因素保持天然联系的少数民族作家之外，一些支撑苏联文坛的俄罗斯作家也纷纷作出尝试，而俄罗斯作家中的“四十岁一代”则显出更大胆的追求。对此，《文学报》、《文学问题》、《文学的俄罗斯》曾多次组织讨论。尽管意见分歧，但争论的焦点已经不在于可否利用假定性，而在于如何利用假定性。多数人对创作实践中的新探索给予了积极肯定。七十年代末，批评家阿纳申科夫说过这样一段话：“假若二十五年前哪位研究者预言，七十年代苏联文学中将出现明显的寓言、神话、寓意倾向，人们一定会嘲笑他，说这是不可能的……然而，当我们今天身处七十年代之中，身处当代文学之中时，我们却把这些形式看成我们意识的有机部分。”^②

①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黑格尔在论及东方原始艺术时，否认神的形象是“真正意义的象征”，因为“所用的形象还没有被定作象征（符号）”。（着重号为原文所有，见黑格尔：《美学》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6页。）但黑格尔又称原始艺术中的神为“不自觉的象征”，并将它归于“象征型艺术”。这自然是一种广义的说法，反映着今人的眼光，因为在今人看来，神的形象中包含着一种形式与内容的异质结构，或者说符号结构。按照黑格尔的逻辑，我们也可以把原始艺术中的神看作一种“不自觉的”假定性。

② 阿纳申科夫：《大象就是……大象》，见《文学报》1978年5月17日。

集约化是一种艺术综合上的新型小说诗学。长期以来，苏联长篇小说思维向史诗倾斜。无论从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传统来看，还是从苏联文学作为新型文学的自身需要来看，追求史诗性艺术综合的冲动都是十分强烈的。虽然这种冲动造就像《静静的顿河》这样闻名世界的经典作品，但也使得一些小说过分追求史诗式外在规模，而忽视了作为史诗小说灵魂的内在规模。七八十年代出现的集约性诗学倡导以较小篇幅熔铸巨大内容。它不但对以往的苏联小说诗学来说是革新性的，而且体现出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一种新的小说诗学倾向，同定型于十九世纪史诗小说中的那种宏大、缜密、浑然整一的繁复性诗学形成明显反差。这种集约性诗学出现在七八十年代，有其必然性。它在长篇小说创作中体现得最为典型，但又不局限于长篇，在一些中篇乃至短篇小说中亦有所体现。

本书正是选择以上三种倾向作为考察对象，而不拟对七八十年代苏联小说形式、风格总貌作全面审视。具体思路是：先从理论问题入手，在第一章介绍六七十年代苏联理论界对文学风格问题的探讨。其所以设立此章，是基于这样的考虑：首先，七八十年代苏联小说的繁荣是以五十年代以来理论意识的活跃和文学观念的更新为背景的。当然，对风格问题的探讨只是理论意识活跃的一个方面，但无论从规模、成果以及涉及问题的广度来看，这种探讨都很具有代表性。其次，在文学作品结构、形式、风格观念上，苏联学者的探讨为本书提供了一种理论参照。在对群体的形式、风格现象的把握上，本书直接借鉴了苏联理论界的某些提法，如“风格倾向”一说。

作为本书主体部分的第二、三、四章，则依次考察叙述上的客观化（内视化）、艺术描绘上的假定性化、艺术综合上的集约化。关于叙述视点问题，苏联批评界无论在对七八十年代文学的历次

讨论中，还是在众多的专论中，均较少涉足。^①笔者在第二章尝试利用当代叙述学的某些成果，以较大篇幅对该问题进行探讨。本章的论述依照这样的脉络：从第一人称小说到第三人称小说，从局部的内视倾向到整体的内视化，从一般的内视意味到比较严格的内视点形态，再到具有先锋性质的极端情况。关于假定性问题，苏联理论界和批评界谈得较多，我国研究界也比较熟悉。第三章的任务是，在对众多假定性形式作一定的理论梳理的基础上，揭示它们在创作中的具体形态，探讨它们与作品思想内容的关系，以及对作品风貌的影响。其中，第二、三、四节分别描述创作中的“象征型艺术”诸形式（象征、隐喻、寓言），变形诸形式（拟人、怪诞、幻想），以及神话形式。第四章的重心是以传统史诗小说及其诗学为参照系，对“微型史诗”和集约性诗学作出界定，并对体现集约性诗学的主要结构类型进行描述。

在总的方法上，本书有如下考虑：第一，尽可能将共时性考察和历时性考察结合起来，即：一方面，将七八十年代作为历史过程的一个截面，进行静态描述，列举不同的风格倾向，对每一种风格倾向作细致的内部类型划分，揭示其不同的结构形态及其独特的表现功能；另一方面，将七八十年代作为历史过程的一个结果，考察其历史渊源，确定其在历史大背景中的位置。第二，必要时采用对比研究，以充分揭示七八十年代某些形式、风格因素的新质。比如，不同时期第一人称自传小说的对比，不同时期第三人称小说的对比，传统史诗小说诗学与集约性诗学的对比等。第三，从一般倾向看，理论研究与文学史研究往往在对象以及方法

① 这只是就文学批评而言，而理论界的情况不同。六十年代以来，被西方称为“塔尔图学派”的一部分苏联学者对结构、叙述问题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探索，如，洛特曼的《结构主义诗学讲义》、《艺术文本的结构》（1970），乌斯宾斯基的《布局诗学——艺术文本的结构与布局形式的类型学》（1970）等。这种探索同法国结构主义几乎是同步的。然而，尽管“塔尔图学派”在国际上很有影响，但在国内还是一个非主流的理论流派，不少人对它持批评态度。因此，其理论成果只是在很有限的程度上转化为文学批评意识。

上壁垒森严，前者容易陷入纯抽象概念和体系的叠床架屋，而后
者则容易变成一种缺乏理性概括的烦琐描述。这里，似乎应该有
偏于中间的道路可走。本书试图在考察小说创作实际时，增加思
维的深度，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对具体课题有所超越。具体做法是，
一方面，对论述中涉及的某些繁难而有争议的理论问题，进行必
要的辨析，另一方面，在对具体现象的把握中，力求揭示出一些
具有普遍规律性的东西。

在回顾苏联文学这段咫尺之遥的历史时，不禁使人想起，八
十年代初，苏联颇有才气的批评家库兹涅科写过一本书，名曰
《苏联文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所谓“明天”，指的是“八十
和九十年代，二十一世纪的前夜”^①。作者满怀信心，对明天做了种
种展望。但此书问世后仅仅十年，苏联文学便永远失去了今天，更
失去了明天，在国内国外落到“明日黄花蝶也愁”的光景。

然而，今天与明天是否应该失去苏联文学？

在与明天对话之际，是不能不与昨天对话的。对于苏联文学，
无论我们如何估价，有一点不可否认：这是一份巨大的精神遗产。
它的多方面价值，它的成败得失，有待细加评说。在未来的文化、
文学建设中，我们将频频回头，审视世界文学的这段独特的历史。

① 库兹涅科：《苏联文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莫斯科，苏联作家出版社，1981，
第406页。作者在写完此书后不久逝世，并没有亲眼看到苏联文学的“明
天”。

第一章 风格——理论上的新探索

第一节 “什么是风格？”

理论思维的深化常常以在新的起点上提出老问题为开端。

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形式和风格的话题越来越为苏联文论家和批评家们津津乐道。从俄罗斯文学传统看，这不是新话题，而是旧话重提，或者说，是一种中断的传统的恢复。

俄罗斯早期文艺学深受拉丁诗学和演说术的影响，涌现出许多拉丁学派的韵律学、语法学、作诗法、演说术等著作。十八世纪俄罗斯大学者罗蒙诺索夫是促使本民族学派文艺学形成的关键性人物。他的贡献也是在诗学和修辞学方面。他所总结的诗歌音节和重音格律系统沿用至今。他尤其关注本民族语言的表现性和描绘性问题、风格问题，提出了著名的“三体”之说，为俄罗斯散文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十九世纪是俄罗斯文艺学迅速成熟和长足发展的时期，也是各种学院派文艺学竞相创立的时期，如神话学派、文化历史学派、比较历史研究、心理学派等。尽管这些学派将研究重心放在社会、文化、心理的溯源上，但大多对作品本身，对诗学和语言保持着浓厚的兴趣。

本世纪二十年代，风格问题曾是理论界的热门话题。俄苏形式主义者对形式、风格的兴趣自不待言。这一点从人们赋予他